

缅怀我慈母和良师的教导

年已九旬的我还时常想到慈母和良师给我的宝贵教训。记得我在江苏无锡东门内东林小学初级班时，每天上学的时候，要经过一座小石桥。有一天细雨绵绵，路上泥滑难行，我在过桥时滑倒了，竟将母亲给我的两块银元掉下河里。当天下午回家后我将这事告诉母亲时，她没有责罚我，却流着泪掐自己的大腿。看到她这样伤心，我便跪在她面前哭着说：“妈妈，今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都要时时当心，到我将来能赚钱时，一定归还这两块银元。”母亲听了我的话后就把我搀起来。从此以后，我无论做什么事都非常小心谨慎。因此，在我参加革命地下工作二十五年中，从未出过漏子。

他的修身课，他的课讲得有声有色，课后他常和我们小学生们恳切地交谈。我记得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要我每天早上从家里到学校和晚上放学时，在路上不要东张西望，免得浪费时间和受坏人的引诱。有一次，他劝我不要跟随大人们上茶馆，免得浪费时间和沾染一些坏习惯。他上课时往往要我们小学生提问题，好为我们解答。在无论什么场合，他都非常注意学生们的言行，随时加以指导。我离开黄老师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但他的音容笑貌还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十二岁时我跟随父母到了湖南长沙，考入了明德中学，当时的校长是胡子靖先生，1913年我升入高一，我们的历史老师是傅熊湘先生（字君剑），他曾在日本留学，是同盟会会员。他给我们上历史课时，头上戴着一顶瓜皮帽，为的是遮住他那条假辫子。有一次，他在课上声色俱厉地痛斥曾国藩反对洪秀全时，我马上在课桌上画了一个曾国藩，并在他的颈上加了一把刀。他的历史课，激发了我的革命思想。十一年后我在北京大学任教，那年初夏，我还专程到湖南醴陵去拜望过傅先生。

1915年，我在明德中学毕业的那年，曾经到青年会听一位美国人的讲演。他说：“我国植物学家路沙·卜班克在加利福尼亚选用各地的橘种，培植出优良的金山橙，它比普通的甜橙大得多，用刀剖开，橙汁四溢，香味扑鼻。你们猜不到，这金山橙还有你们四川橘种的成分呢。……”当时心想：我要到加利福尼亚去向路沙·卜班克学习，将来也要为我国培植出那样好的甜橙。

回家后，我要求父亲给我路费到美国留学。他说：“你应当考入北京大学，待毕业后争取公费留学。”当时我想：如果四年后再去美国，也许路沙·卜班克已不在人世了。于是我开始绝食，表示赴美的决心。幸在绝食的第四天，母亲见我精神萎靡，面容憔悴，才知我绝食的原

我的外祖父是一位富商，他在无锡开设了一家有名的顾万昌糟房。母亲虽出身于富裕之家，却没有读过书。但她见识广、为人正直。由于天资聪慧，凭记忆她能背诵出许多格言、成语，直到现在，时隔二十八年，我还记得她教导我的许多话，这些话对我的思想品德、学习和工作都有很大的影响。她曾说过“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拳不离手，曲不离口”、“饱人不知饿汉饥”、“不听好人言，终吃苦黄连”等，以上这些话对我的学习、工作、为人都受益不浅。

现在我们常说凡事要走群众路线，要能以身作则，为人要光明磊落，做领导的要平等待人等等，我在生活工作中就常常想起母亲说过的同样中肯的话，如：“做人总勿要做到诸人回避”、“上梁不正，下梁歪”、“情愿明枪交战，不要暗箭伤人”，“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等等。从母亲所引用的这些成语看来，她虽是文盲，但她的理解力却是非凡的。

上面我提到的东林小学，校舍就是明代末年东林党人高攀龙和顾亭林等人所组织的东林书院的旧址。我上初小时，黄淡如老师担任我

我激动不已的事情

许杰

前些日子，我收到一个学生从新疆伊犁寄来的一本杂志，上面登着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廿九年后的一封回信——给许老师》。这个学生我一直到现在还没见过面，也根本不知道有这个学生，完全不记得他的姓名，不记得在廿九年前曾经复过他一封信。可是他却称我作老师，说是由于我的一封复信，就决定了他半生的道路和命运，我这封信导致他过了整整二十九年的苦难生活。读信之后，我心情激动不已。

随后，他又寄来了一封通常的信，告诉我他现在在伊犁安居乐业的情况。信里，还附寄了一张合家欢的照片。读过这封信，我更安不下心来。我立刻给他写了回信。

原来，在二十九年以前，这个学生曾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学习，而我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授，那时，他写了一封信给我，向我提了一个什么问题，我只是如同平常一样，对年青人不问是否相识，有信必复，以免使他失望。当这个学生收到我的复信时，他同宿舍的同学也都看了这封信。当时有些同学还表示了高兴和羡慕。可是正当这个学生又想写信给我的时

候，她便将陪嫁的首饰当了给我做路费，我带着母亲给我的两千银元，瞒着父亲离家，从长沙经汉口到上海乘上两千吨的中国号小轮船到了旧金山。

到美国的第一年我在一个预备学校学习，次年1916年的7月考入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珀玛拿大学，上一年级时，植物学是我主修的课程，上二年级时，地质学是我主修课，在这两个学年中，我的成绩仅仅勉强及格。因我视力不好，用显微镜将植物分类或在野外考察地质时往往犯错误，不免使我垂头丧气。这时幸运地

候，反右运动起来了，一时上海报纸登了不少揭发批判“大右派许杰”的文章。就在这个时候，复旦校方也逼着和我通了一次信的学生交代，并且要他揭发。但是，他除了信上说的以外什么也揭发不出。因此，他就被判为态度顽固，成了包庇大右派的顽固分子，被罚下放劳动，他这个班毕业时，他就被发配到新疆劳动改造。这一去，一直在那儿过了二十九年。

二十九年间，他的父亲因忧愤去世，母亲接着服毒自杀了。而他的妻子却是比影片《牧马人》中的那位姑娘更加坚定可爱。原来当这个学生被错划为右派的时候，那位姑娘还是师院的学生，他写信约她到南京西路大光明电影院相见，他当时抱歉地表示，要和她断绝关系，希望她免受牵连。可是这位姑娘却坚决不肯。以后她抗拒了父母的劝告和压力，忍受了师院团组织的训斥和处分，到毕业后竟直奔新疆，和正在遭受屈辱的对象成了夫妻。两人在新疆共同劳动、共同吃苦，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现在，他们作为边疆难得的人才已开始文教战线上发挥着作用。

我之所以心情激动，就因为党中央拨乱反正，遵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不仅使八十五岁的我枯木逢春，也终于使比我年青的有用人才消除了冤屈，得到了尊重。对英明的中央，我怎能不万分感激与爱戴呢！

遇到了一位原丹麦籍的历史教授韦斯特加德，他劝我改学世界史和俄国革命史。

在我读世界史的那年，韦斯特加德教授指出经济发达的国家，必然要扩张势力，侵犯经济落后的国家。就在一个国家里，经济发达的地区，也会剥削经济落后的地区。他还说，经济的发展，必须靠政治作后盾，所以垄断财阀往往依靠政治力量达到他扩张经济的目的。

自从听了韦斯特加德教授的这些话以后，我对历史的看法就不那样简单化、口号化了。现在回想起来我受到慈母和良师的教益实在不少。